

無政府主義與 廣州共產黨之源

• 曾慶榴

廣州早期共產黨組織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實際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並親自參與下組建起來的，而「廣州共產黨」與無政府主義亦有若干歷史因緣，但目前的中共黨史著述，對這兩個問題的闡述均語焉未詳，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本文擬梳理有關的史料，對此做些具體的說明，以就正於識者。

廣州早期共產黨組織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實際是在陳獨秀的指導並親自參與下組建起來的，而「廣州共產黨」與無政府主義亦有若干歷史因緣，但目前的中共黨史著述，對這兩個問題的闡述均語焉未詳，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

一 關於「社會主義者同盟」

安那其主義 (Anarchism) 即無政府主義，是先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一種思潮。陳獨秀、李大釗分別在滬、京創建中國共產黨之初，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介入、參與。

中國無政府主義宗師劉思復 (師復) 的追隨者、廣東無政府主義「元生代」人物梁冰弦，1951年以「海隅孤客」的署名在香港發表〈解放別錄〉一文，回憶起1920年代初中國安那其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與俄人交往的一些情況①：

晦鳴學舍被迫遷移到上海後兩年，劉師復積勞病逝，長眠杭州煙霞洞，《民聲》周刊亦或作或輟，惟國內外同志通信討論種種，郵簡往返絡繹。1920年春間，接到一封用世界語寫的信，署名是布魯威，信則發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紹，說他是布爾什維克黨人而久居華北。他又說由閱讀《民聲》世界語版，知道自1911緊跟辛亥革命後即有自由社會主義者一群，在華南恣力宣傳，結果現代最健全的思想體系，深入人心，實為五四學生運動的原動力。數年來中國的社會運動，沒有其他派別的人領導着。他相信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者對蘇聯的革命領導者布爾什維克黨人不會生疏，或許會樂於攜手，這是他發這封來信的緣故。

那時留守學舍的鄭佩剛，把布氏的信寄於北大黃超海，讓他就近接洽。黃氏約同陳獨秀、李大釗與布氏在天津敘話幾回，結果產生一個「社會主義者同盟」……

是年5月，莫斯科派出另一黨員到上海。那人名字叫斯脫洛米斯基，並一華人楊明齋。……其時陳獨秀剛離開北大，南下上海，住在法界漁陽里2號。……一個晚上，陳寓召集會議，讓斯脫洛米斯基與同盟份子會面，並商談一些展開工作的計劃。除陳和斯氏外，那晚與會的為沈定一（不久之後在蕭山被暗殺）、李漢俊（不久之後在漢口與詹大悲同遭槍斃）、尉克水、袁震瀛、俞秀松、鄭佩剛，還有朝鮮獨立黨魁後遭暗殺的金九。

梁氏以上敘述，可以與當年無政府主義活躍人士鄭佩剛1964年對廣東黨史工作者的談話對照起來參讀。鄭自謂：當年他隨師復輾轉於廣東、上海各地，是「晦鳴學舍」留守上海的人物，在滬與吳玉章、陳延年（陳獨秀長子）等人結識，出版《進化》雜誌。1919年5月，鄭在上海被捕，入獄六個月，《進化》事務由陳延年負責。出獄之後，鄭於1920年2月返廣州。3月間，鄭接到北京黃凌霜來信，「說他到天津與俄國朋友Broway接洽，並約同陳獨秀、李大釗等開會，成立『社會主義者同盟』，推舉陳獨秀為領導。並說陳獨秀將到滬活動，要我返滬相助」。於是，鄭3月底由廣州赴滬。5月間，陳獨秀以領導人的身份在上海組織「社會主義者同盟」。「某日夜晚，在陳獨秀的家裏（漁陽里2號）召開『社會主義者同盟』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精神，討論積極開展社會革命工作的問題。出席會議者有Stromisky、楊明齋、陳獨秀、李漢俊、尉克水、袁振英（袁震瀛）、俞秀松、金某（朝鮮人，金九？）、一個印度人和我。」②

梁冰弦的文章發表於1951年，文中的布魯威與鄭佩剛說的Broway是同一個人；梁文中的黃超海，即鄭提到的黃凌霜。鄭說到，在上海陳獨秀家中參加「社會主義者同盟」會議的，有「俄人Stromisky」③。鄭的這篇談話記錄在幾經轉錄的過程中走了樣：收進《「一大」前後廣東的黨組織》一書時，被寫成「俄人Slvomisky」④；而收入《「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一書時，則被改寫成「俄人Slromisky」⑤。查陳登才整理、鄭佩剛審閱過的〈訪問鄭佩剛先生的記錄〉（1964年油印本），原本的寫法是「俄人Stromisky」，梁文中的「斯脫洛米斯基」顯然就是Stromisky的中文音譯。故梁、鄭二人所述的情況是大致吻合的。目前，關於「社會主義者同盟」和斯脫洛米斯基的情況已很少被人提起，有關的史料亦未顯現於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解密檔案，但「社會主義者同盟」的存在及斯氏來華的史實，則是不應輕易否定的。

「社會主義者同盟」是一個在俄人推動下成立的、以陳獨秀為領導人的鬆散聯盟。據鄭佩剛回憶：「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活動中心在北方是北京，主要人物有李大釗、黃凌霜、華林、Broway等，出版《勞働音》；在華東是上海，有陳獨秀、李漢俊、鄭佩剛等，出版《勞働界》；在華南是廣州，有梁冰弦、劉石心（師復弟）、W君等，出版《勞働者》。《勞働音》、《勞働界》和《勞働者》都是周刊，是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共同參與編輯的推動勞工運動的姐妹刊物。「社會主義者同盟」並指定委託鄭佩剛負責，借用晦鳴學舍的印刷器材開辦「又新印刷所」。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陳獨秀主

目前，關於「社會主義者同盟」和斯脫洛米斯基的情況已很少被人提起，但「社會主義者同盟」的存在及斯氏來華的史實，則是不應輕易否定的。「社會主義者同盟」是一個在俄人推動下成立的、以陳獨秀為領導人的鬆散聯盟。

編的《新青年》和《共產黨》月刊，以及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主編的《自由》，都是這家印刷所印刷的^⑥。

本文所要關注的，主要是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情況。

梁冰弦在其回憶文章〈解放別錄〉中提到廣州「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主持者，有梁冰弦、區聲白、李少陵、黎昌仁等。當時，有「社會主義將軍」之稱的陳炯明正率兵駐紮福建漳州，悉心整頓部隊，拆城修路，築堤治河，禁煙禁賭，有意將閩南「護法區」搞成社會主義的「試驗區」。陳為開闢閩南工作新局面而引進了大批新派人物，不但將朱執信等人作為重要助手而置諸身邊，而且將晦鳴學舍時的「舊人」梁冰弦及有關人員招攬至漳州工作。在此之前，陳曾追隨師復，並且是師復組織的暗殺團成員之一，他與梁的「舊人」關係，即根源於此。梁冰弦寫道^⑦：

其時梁氏在穗垣方與軍政府的司法部長徐謙，參謀本部次長戴立夫，四川督軍熊克武代表吳玉章及好些直魯豫滇桂籍之非常國會議員，積極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發展。經向同人協議，無妨將華南中心移於漳州，梁遂於秋後攜同一批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熱烘烘地向那小王國去。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陳獨秀為書記。陳函約各地成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的團組織，譚平山（陳獨秀在北京大學的學生）等因之在廣州起而響應，於當月成立了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

梁冰弦等人在漳州創辦《閩星報》和《閩星》半周刊，陳炯明親為《閩星》撰發刊詞。梁並參與接待由黃凌霜陪同到漳州考察的俄國人V氏（即波達波夫[Poliakov]，化名路博）。稍後，梁向陳建議增設閩南護法區教育局，陳即據以實施，並請梁擔任局長，而梁卻轉薦「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發起者陳獨秀出任局長。陳獨秀雖然未能應邀而來，但是這一提議，卻為陳獨秀後來入粵任職作了鋪墊。

1920年秋，陳炯明率粵軍由閩返粵，於10月29日攻克廣州。在漳州的「社會主義者同盟」成員先後返回廣州。師復創辦的《民聲》亦在廣州復刊。

二 「廣東共產黨」（「共產黨廣州部」）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陳獨秀為書記。陳函約各地成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的團組織，譚平山（陳獨秀在北京大學的學生）等因此在廣州起而響應，於當月成立了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⑧。《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章》規定以「研究社會主義，並實行社會改造」為宗旨，方法是：一、幫助勞工組織和教育，二、調查勞動狀況；三、文字宣傳；四、演講^⑨。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Gregori Voitinsky，又譯維經斯基）派人到廣州組織「革命局」。魏金斯基在上海致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民族處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在中國各工業城市建立與上海革命局相類似的局，然後借助於局代表會議把工作集中起來。目前還只建了一個北京局，該局在按照我的指示與米諾爾同志和柏烈偉教授合作。現在我把米諾爾同志從天津派往廣州，他要在那裏組建一個革命局。」^⑩

米諾爾原名斯托揚諾維奇（Konstantin A. Stoyanovich），與他一起來粵的別斯林（Leonid Perlin，又譯佩爾林、波林或波爾西），兩人均為俄共（布）黨員。他們

在北大粵籍學生黃凌霜的引薦下，於8月下旬或9月間抵達廣州，在東山恤孤院路15號建立俄羅斯電訊社（羅斯塔）^①。黃當時是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也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被梁冰弦譽稱為「始終篤信自由社會主義」的「佼佼者」^②。在廣州，黃將米諾爾、別斯林引薦給梁冰弦（梁於粵軍回粵之前返廣州，任職於廣三鐵路局）、區聲白、黃尊生、劉石心等。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之後，他們共同成立了「廣東共產黨」，由米諾爾、別斯林和七名無政府主義者「擔任黨的執行委員」^③。

此時，「廣東共產黨」與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應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組織。被鄭佩剛稱為「社會主義者同盟」刊物的《勞働者》，由米諾爾、別斯林出資，主要的撰稿人有黃凌霜（兼生）、梁冰弦、黃尊生、劉石心、薛劍耘、傅無悶、梁一余等。梁冰弦的文章還寫道^④：

敏諾〔米諾爾〕於華南區同盟工作大感興趣，尤其是粵中的勞動運動。在他眼中，機器工會為領袖工會，其規模在歐洲也不多見。波爾西興奮地搜求這一工人組織的由來變革，著為紀錄報告材料。……敏諾順帶有一宗使命：那時蘇俄特設塔斯通訊社，向世界傳布新蘇維埃國家政情。可是自唱自聽，就在中國自北向南便設有一家報紙採用他無條件贈與的電訊。敏諾再三請求華南同人設法。當時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三人皆由北大畢業歸，企圖競選省參議員，辦一「群報」來自我介紹。公博願以「群報」作為華南區同盟準機關報，條件為由冰弦向競存〔陳炯明〕取得每月津貼二千元。同時「群報」選登塔斯電訊，喜得敏諾每周將報紙，匯寄莫斯科來充實他的工作報告。

1920年10月當駐閩粵軍回粵時，《勞働者》第二號以〈共產黨的粵人治粵主張〉為題，刊登了一篇「廣東共產黨警告粵人」的傳單，標題是〈苦的是平民！怎樣才是快樂呢？〉，文中說：「根本的解決辦法，只有平民振起，由農夫勞動者的組合，把一切政治機關推翻，把一切金錢組織推倒，實行共產主義去！」「根本的改革不是做爭回粵人政治支配權而止，是要做到老百姓爭回生活支配權而止。我們從速組合農夫勞動者的團體呵！爭回衣的、食的、住的、用的支配權，生活自由、使用自由，這才是我們的根本辦法呵！」「你想登天國嗎？想過極樂世界的快活生涯嗎？想免除一切生活的痛苦嗎？你快準備着你快準備共產革命的運動！」^⑤「廣東共產黨」的名稱，在這裏首次出現，其治粵主張由此公諸於世，可見這個「黨」的歷史存在，在廣州的報刊中乃是有文可證的。

12月24日，《廣州晨報》以〈共產黨廣州部的傳單〉為題，登出了一篇在「本城各馬路」散發的印刷品，全文如下^⑥：

卻說過去不甚久的時候，在歐洲出了幾位學者，如巴枯寧，如蒲魯東，和現在還在的克魯泡特金，世人都認為「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元祖。除了這一派最純全、最圓滿、最正大的之外，還有奧文〔歐文〕的烏托邦派、有符利亞〔傅立葉〕的協社主義派，有馬格斯〔馬克思〕的集產主義派。各派的學說固然其繁重，就單講第一派，也千萬句話不能盡。用至單簡的話說，舉其大要是：（一）個人在社會裏的平等，男女智愚都一樣；（二）個人的身心，都要完全的自由；（三）貧富貴賤的階級消滅盡淨；（四）年幼少年的，沒一

迄今為止，關於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廣東共產黨」以及「共產黨廣州部」，能見到的史料並不多，這幾個差不多同一時間出現於同一座城市的團體，其名稱雖然不同，但當事者可能都是同一批人，是步師復後塵的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是他們的同情者。

人不要受過教育，壯年的沒一個不要工作，老年的沒一個不受社會的公養；(五)那時候世界上只有許多自由組合的團體，處理生產分配的事，再沒有政府，沒有軍隊，沒有不工作白吃飯的富人，沒有各樣的頭目，也沒有國家，沒有家族。綜合這些主張，就叫做「無政府共產主義」。這主義確立以來，贊同的人一天一天多，於是由理想進到實行，首先把政府與資本家撲滅，這種行為，就叫做「社會革命」。自從「無政府共產主義」輸入中國以來，早已有許多人大表歡迎了，再加西洋人社會革命運動的消息和勝利的佳音，不絕的傳來，於是中國裏不少的同志者，也奮起來一致的進行了。所以我說世界不久有大變動，諸君準備着。且把我們的社會革命進行的方法，也略說說。第一，我們的敵人是——政府、官吏、軍人、資本家、一切和我們反對的頑固者；第二，我們要破壞的是——政治制度、資本制度、家族制度、一切舊社會的惡劣制度；第三，我們要求多數平民的同情，先要求他們覺悟，所以傳播的法子是——演講、傳單、書籍、教育；第四、我們破敵的方法有兩種：(一)單獨進行的是暗殺，各方面的運動；(二)共同進行的是罷工、抗稅、齊起革命。我們經過十多年的運動，時機今到了，贊同的、協進的人多了，各行省、各都會乃至各村鎮都播滿種子了。諸君的迷惘見解如果破除了，受現社會的痛苦受夠了，想望幸福想得切極了，請研究社會革命的理論，請加入社會革命黨。共產黨廣州部印。

「廣東共產黨」是1920年秋左右在廣州成立的、以「共產黨」命名的一個新組織。參加這個「黨」的廣州人士雖然多是些無政府主義者，但是這個「黨」是共產國際使者在穗發起組織的，因此這個「黨」與後來廣州共產黨組織的聯繫，是不應切割開來的。

《廣州晨報》是廣州無政府主義派的新聞堡壘，從內容不難看出這張傳單所宣示的顯然是「無政府共產主義」及其「社會革命」的主張，可見「共產黨廣州部」的人員也是一批無政府主義者。

迄今為止，關於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廣東共產黨」以及「共產黨廣州部」，能見到的史料並不多，有關情況尚不完全明晰，然而從迹象上看，這幾個差不多同一時間出現於同一座城市的團體，其名稱雖然不同，但當事者可能都是同一批人，是步師復後塵的無政府主義者，或者是他們的同情者。

在筆者看來，「廣東共產黨」（「共產黨廣州部」）是繼師復使用「無政府共產黨」（1914）的名稱以後，於1920年秋左右在廣州成立的、以「共產黨」命名的一個新組織。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個「黨」的廣州人士雖然多是些無政府主義者，這個「黨」雖然已經被批評為「與其稱作共產黨，不如稱作無政府主義的共產黨」^⑩，但是如前所述，這個「黨」是共產國際使者（米諾爾和別斯林）在穗發起組織的，他們親自參加了這個「黨」，並且擔任了「黨的執行委員」，因此這個「黨」與後來廣州共產黨組織的聯繫，是不應切割開來的。

三 「安」、「馬」分流

1920年12月，在上海從事共產黨創建活動的陳獨秀，應廣東省長陳炯明的邀請南來廣州，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同時指導並參與組建廣州共產黨組織。陳獨秀一到廣州，就碰上如何處理與無政府主義者，即與「廣東共產黨」的關係這一難題。

有的中共黨史學者認為，斯脫洛米斯基就是魏金斯基，如胡慶雲〈何謂社會主義者同盟〉一文說：「1920年夏，共產國際派人到上海……，他們是Stromisky（魏金斯基）……」^{①⑨}。楊奎松的〈從共產國際檔案看中共上海發起組建立史實〉一文在引用鄭佩剛的回憶時，也將「在陳獨秀家中召開社會主義者同盟會議」的那位俄國人，說成是魏金斯基^{②⑩}。李繼鋒、郭彬的〈袁振英與陳獨秀關係述略〉一文也有類似的說法^{③⑪}。這是值得商榷的。據梁冰弦說，斯脫洛米斯基早於魏金斯基來華，梁明確寫道：「代表第三國際留在上海的斯脫洛米斯基奉召回去，莫斯科改派倭挺斯基（魏金斯基）來滬，與獨秀等籌劃解散社會主義者同盟，徑行組織共產黨。」^{④⑫}魏金斯基到達上海後，華北、華東各地「社會主義者同盟」隨即被解散，上海共產黨組織也成立起來了。

然而在廣州，解散「社會主義者同盟」和直接組黨卻遭遇到困難和阻力，主要是因為廣州無政府主義者人數比較多，影響較大。「獨秀以〔社會主義者同盟〕力量在華南，華南份子向不同意，有待於說服」^{⑤⑬}。然而，魏金斯基卻急於將他的計劃付諸實施。就此，梁冰弦寫道^{⑥⑭}：

倭挺斯基也更惱了，非御駕親征不可。於是一口氣由上海奔來，費了一周的工夫，在他的「行轅」裏聽取報告，檢討一切，然後發下一度命令給他的「屬員」，着通知同人某日舉行會議。到那一天，華南區同盟半公開的辦事處作為會議廳，負有任務的各人都齊集，惟陳獨秀預日託故離開廣州作短程旅行，避不出席。敏諾和波爾西陪同倭挺斯基到會。入座後，倭打開公文包，檢出一帙14張紙用英文打字的講稿，抑揚頓挫地宣讀，讀了50分鐘，住了聲，坐下來聽候大家辯論。倭的講詞，前半是馬克斯哲學，列寧的革命方法。照他說是放之六合而皆準的。後半譴責中國自由社會主義者，既與蘇俄革命工作者表面合作，骨子裏卻百分之百安那其，故思想、言論和行動無往而不相抵觸。結論提出兩點：自由社會主義者放棄成見，絕對從同馬列主義者，不然解散組織，各行其是。……〔無政府主義者表示〕就此分手吧，再會。

魏金斯基到達上海後，華北、華東各地「社會主義者同盟」隨即被解散，上海共產黨組織也成立起來了。然而在廣州，解散「社會主義者同盟」和直接組黨卻遭遇到困難和阻力，主要是因為廣州無政府主義者人數比較多，影響較大。

梁冰弦以上所寫的魏金斯基在廣州主持、有米諾爾和別斯林及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參加的會議，有的黨史學者稱之為「安」（安那其主義）、「馬」（馬克思主義）從合作到分流的會議。在這一段文字中，梁提供了一條很值得重視的史料：「惟陳獨秀預日託故離開廣州作短程旅行，避不出席。」按梁的說法，「安」、「馬」分流是俄人魏金斯基自定主意，親自來廣州，親手操盤、督辦的結果。在廣州時，魏金斯基曾與陳獨秀「一起拜訪了陳炯明將軍」，次年1月12日才返回上海^{⑦⑮}。魏氏當時來過廣州，那是確切無疑的。

至於陳獨秀，來到廣州後他曾希圖與無政府主義者繼續合作，曾與梁冰弦、劉石心等人聯繫過，並將他草擬的共產黨「黨綱」交給他們討論。梁、劉等人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同他們的基本理論相悖，因而反對在「黨綱」中寫上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理論觀點的分歧，加速了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黨人分道揚鑣的進程。據劉石心回憶^{⑧⑯}：

有一次，陳獨秀對梁冰弦說，全國的「社會主義者同盟」解散了，叫梁冰弦向我們轉達，叫我們加入共產黨。我當時少年氣盛，覺得這種奉命加入是一種壓力，不服氣。而且，當時《民聲》雜誌就不同意「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提法，主張個人絕對自由，所以後來陳獨秀組織廣東共產黨，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不同意這個觀點，因此，我們沒有加入共產黨，各走各的路。

1921年1月15日，陳獨秀在廣東省公立法政學校作〈社會主義批評〉的演講，對各種「社會主義」作了剖析，着重批評了無政府主義，指出「無政府主義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22日，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發表反駁陳獨秀的文章，一場論戰遂在《廣東群報》展開^⑥。陳獨秀三次回答區聲白所闡述的問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大半是遠的將來社會組織問題和終極的法律存廢問題」^⑦，即純學術問題。陳獨秀當時「避不出席」決定與無政府主義者分流的會議，看來他對無政府主義所作的學術批評，也是有一定分寸的。儘管如此，但「安」、「馬」分流已成定局，雙方短暫的合作已經成為歷史。

陳獨秀來到廣州後曾希圖與無政府主義者繼續合作，並將草擬的共產黨「黨綱」交給梁冰弦、劉石心等人討論。但梁、劉等人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同他們的基本理論相悖。理論觀點的分歧，加速了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黨人分道揚鑣的進程。

讀各種中共黨史著述，可知過去許多人都對「安」、「馬」分流作過肯定的評述，認為與無政府主義的決裂，對日後共產黨的建立和健康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揆諸史乘，我們卻發現分流也對中共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師復一代安那其主義者對引進自由社會主義所作的努力、對理想社會的追求，以及他們的品行操守，都有值得肯定之處。師復死後的無政府主義者中，雖然也有陳獨秀在〈下品的無政府黨〉中所貶斥的那一類人，但並非全屬「下品」，其中不乏有志於社會改造、多年來熱心於工人運動的人士。陳獨秀也說，此時的區聲白「算得上是個純潔的青年」^⑧。對於他們從事勞動運動的情況，梁冰弦有過如下的夫子自道^⑨：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蘇俄十月革命前數年，只七、八個覺悟的機器工匠和機器廠員司，賃一幢小屋，設一小小俱樂部，每晚工餘集合，由梁冰弦、劉石心、區聲白、黃尊生等，輪流出席，講解克魯泡特金所著《麵包略取》、《工廠與田莊》、《告少年》諸書，又系統地講授社會主義史，歐美勞動運動史，各國採行勞動立法、勞動保險等社會政策概況，孫先生的民生主義真諦等。這七八個人，漸漸號召群工，領導進行組織工會〔機器工會〕。始而數十人，瞬而數百人。經過一年後，達數萬人，支、分會遍東、西江以至南洋群島，為一有靈魂、有生命的組織體。

梁冰弦所述或許有誇大之詞，但他們在工人中從事的宣傳、組織工作及「廣東機器工會」的活動和影響，並非全出於虛構。俄人魏金斯基一手策劃，並由他親自操盤、督辦的廣州「安」、「馬」分流，顯然將一批雖然思想信仰不同但卻是熱心於工人運動的人「分」了出去。受他們影響的那批機器工人，跟着也分離出去了。成立時間較長的廣東機器工會，從此脫離共產黨的影響，並且愈走愈遠。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剛成立時卻未能掌握那批現代產業工人，其損失是不言而喻的，這對後來廣州工人運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四 「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黨」

陳獨秀到廣州之後，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商談組建廣州共產黨組織的問題。譚、陳三人均為北大學子，在北京受過新文化運動的薰陶。譚平山曾在《政衡》發表〈中國政黨問題及今後組織政黨的方針〉，認為政黨是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組織政黨應以一定的主義為中心，黨內應注重政治問題的研究，應針對中國情勢提出明確的政綱等^⑩。可見他對組建政黨的問題，曾作過一定的思考研究。北大畢業返粵後，譚平山、陳公博任教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譚植棠任教於廣東法政學校。如前所述，他們於1920年8月間應陳獨秀之函約發起成立了「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10月間創辦了《廣東群報》。由於上文所述「安」、「馬」分流已成定局，無政府主義者退出，陳獨秀遂考慮以《廣東群報》的編輯人員為主要對象，組建「廣州共產黨」。

《廣東群報》創刊之日，正是粵軍回粵，越過惠州之時。由陳公博任總編，譚平山編新聞，譚植棠編副刊。《廣東群報》初創時，熱衷於宣傳「群性」之說，認為「群性」即互助互濟是人類的一種「本能」，主張「發展群的本能，剷除群的障礙，鞏固群的壁壘，增進群的樂利」^⑪。「群報」的命名即來源於此。該報不但連載克魯泡特金 (Petr Kropotkin) 所著，區聲白譯的《互助論》，還刊登了不少無政府主義者的文章。陳獨秀來粵後，該報版面發生重大的變化：1921年的元旦增刊在最重要位置登出列寧的照片，隨後大量轉載上海《共產黨》月刊的文章。《共產黨》第一期出版於1920年11月7日，第二期出版於12月7日，而《廣東群報》直至12月末才開始轉載其第一期的文章，說明與陳獨秀的到來是有關係的。

1921年春，在陳獨秀的主持下，在廣州「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黨」。黨組織的名稱，最初稱「廣州共產黨」^⑫，最早成員中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是《廣東群報》的編輯。曾與無政府主義者一同成立「廣東共產黨」的米諾爾和別斯林，轉而成為「廣州共產黨」的成員。此時，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沈玄廬、袁振英、李季正隨陳獨秀到粵工作，武漢早期黨組織書記包惠僧受上海黨組織派遣到穗見陳獨秀，這幾個人也參加了「廣州共產黨」組織的活動。在五四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廣州學生周其鑾、阮嘯仙、馮菊坡等，此後陸續加入了「廣州共產黨」。「廣州共產黨」先由陳獨秀、後由譚平山任書記，陳公博負責組織工作，譚植棠負責宣傳工作。

廣州是中國工人階級誕生最早、人口較集中的城市之一，1920年前後有工人、手工業者、店員約20萬人。1920年5月1日，廣州工人在東園召開第一次「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參加遊行人數達5萬餘人。1920年冬至翌年春全市先後成立了30多個工會^⑬。五四運動之前，廣州「共和工黨」成立，總部設於永漢南路，鄭蒼生任「黨長」，約有黨員百人。《廣東中華新報》報導過五四前後共和工黨的一些活動。據參加過這個黨的梁復然回憶：鄭蒼生曾參加辛亥革命，後留學日本，其組黨的宗旨是「模仿蘇俄」，在中國開展革命活動。工黨黨員中的陳俊生是陳公博幼年時的同學，當譚平山、陳公博在廣州開展共產黨的宣傳和組織活動時，陳俊生任《廣東群報》校對，引陳公博會見鄭蒼生。鄭將工黨成員梁復然、劉覺非、陳卓生、陳俊生、梁鐵志、郭植生、王寒燼介紹給陳公博。譚平山乃將這些人組成小組，指示他們到工人中開展活動。梁復然、郭植生、王寒燼後來加入了「廣州共產黨」^⑭。

由於「安」、「馬」分流已成定局，無政府主義者退出，陳獨秀遂考慮以《廣東群報》的編輯人員為主要對象，組建「廣州共產黨」。1921年春，在陳獨秀的主持下，在廣州「開始成立真正的共產黨」。

1921年7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就要召開、「中國共產黨」即將宣告誕生的時候，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文中寫道^⑤：

我以為共產黨底基礎建築在無產階級上面，在理論上，自然要好過基礎建築在有產階級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黨。但是天下事「無證不信，不信民弗從」，舊政黨底腐敗誠然是信而有證，新的共產黨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證據來才能夠使人相信呵！

7月1日後來被定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紀念日。陳獨秀當時在廣州寫下的這篇短文，言簡意深，對「新的共產黨」寄予了殷切的期望。這可以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廣州向世人發出的一篇簡短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廣州共產黨」參加黨的一大的代表是陳公博和包惠僧。廣州黨組織向大會提供的報告，說明了黨組織成立的經過及主要工作，提出今後以發展黨員、成立工會、舉辦工人學校、加強對農民的宣傳、爭取軍隊官兵入黨的工作重點。陳公博回廣州後，由譚平山主持召開廣州黨員會議，聽取一大精神的傳達，宣布吸收一批新黨員。黨組織的名稱，這時稱「中共廣東支部」。

綜合有關資料，廣州早期黨組織的成員約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阮嘯仙、馮菊坡、梁復然、林祖涵、楊匏安、楊章甫、譚天度、張善銘、周其鑾、郭植生、陳適曦、王寒燼、羅綺園、劉爾嵩、黃裕謙、郭瘦真、施卜、黃學增、楊殷、潘兆鑾、賴玉潤、張瑞成、沈厚培等。至1922年6月，廣州共產黨員共有三十二人，此時成立了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

陳獨秀在黨的一大當選為中央書記，於9月離開廣州，返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當中國共產黨籌備、創建時，作為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在廣州居留的時間達十個月之久，親自主持、參加廣東黨組織的創建，並擔任廣州黨組織的第一任書記，這種情況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這是廣東早期黨組織的一個重要特點。

當中國共產黨籌備、創建時，作為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在廣州居留的時間達十個月之久，親自主持、參加廣東黨組織的創建，並擔任廣州黨組織的第一任書記，這種情況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這是廣東早期黨組織的一個重要特點。

註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份不詳)，頁8、9；7；30-31；29；29；35-36；30。

②③⑥ 陳登才、鍾寧羽訪問，陳登才整理：〈訪問鄭佩剛先生的記錄〉(1964年2月18日、3月30日、4月29日、5月10日)，載《中共廣東黨史訪問資料》之二十七，油印本(〔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1964)，頁7；7；8。

④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後廣東的黨組織》(廣州：內部刊物，1981)，頁178。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483。

⑦ 海隅孤客：《解放別錄》，頁12。謹按：梁冰弦等人入閩在1919年間，當時華南區有無「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組織，未經查證。徐謙在上海參與過「社會主義者同盟」的一些活動；戴立夫，又名戴任，1922年5月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

大會，後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並曾在黃埔軍校工作；吳玉章後來是著名的共產黨員，早年信仰過無政府主義。這幾個人與華南區「社會主義者同盟」的關係，尚須進一步查證。

⑧ 譚平山說：「廣州區在前年8月亦經成立。」參見譚平山：〈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上致答詞〉（1922年3月14日），載《譚平山文集》編輯組編：《譚平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43。

⑨ 《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章》複印件，日本學者石川禎浩1999年11月向筆者提供。

⑩ 〈維經斯基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1920年8月17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2-33。

⑪ 〈斯托揚諾維奇給某人的信〉（1920年9月29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43。

⑬⑭ 〈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參見《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合刊，頁11。

⑮ 〈共產黨的粵人治粵主張〉，《勞動者》，第二號（1920年10月10日）。轉引自《勞動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頁21、22。

⑯ 〈共產黨廣州部的傳單〉，《廣州晨報》，1920年12月24日。本文開頭說：「昨日西瓜園布道大會，發現有共產黨廣州部傳單很多，同時本城各馬路，亦有着學生們、工人們多人乘坐車發散上項印刷品，並將其原文照刊如下。」原文斷句只用頓號，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本文的複印件由石川禎浩1999年11月向筆者提供。

⑰ 胡慶雲：〈何謂社會主義者同盟〉，《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6期，頁17。

⑱ 楊奎松：〈從共產國際檔案看中共上海發起組建建立史實〉，《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頁84。

⑳ 李繼鋒、郭彬：〈袁振英與陳獨秀關係述略〉，載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八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59。

㉑ 1921年4月21日，〈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於廣州政府的報告〉中說：「1921年1月12日，格里高里·扎爾欣（魏金斯基）同志從廣州回來（他是奉優林之命同柏烈偉一起去那裏的）。」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60。

㉒ 譚康、沙東迅記錄：〈訪問劉石心先生記錄〉（1981），載《勞動者》，頁143。

㉓ 陳獨秀：〈討論無政府主義〉（1921年8月1日），參見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一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281。

㉔⑳ 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頁359；360。

㉕ 譚平山：〈中國政黨問題及今後組織政黨的方針〉（1920年3月），原載《政衡》第一卷第二號。參見《譚平山文集》，頁88。

㉖ 譚鳴謙（譚平山）：〈對於文化宣傳的我見〉，《廣東群報》，創刊號。按：《廣東群報》創刊號未署出版年月，從陳公博「群報出版之日，陳師已越惠州」一語推算，大致是1920年10月19日。引自《廣東群報選輯》，油印本（〔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1964），頁14。

㉗ 廣東黨組織提交黨的一大的報告，稱「廣州共產黨的報告」。此外，陳公博在《寒風集》寫道：「由我們三人成立廣州共產黨」。轉引自《「一大」前後廣東的黨組織》，頁88。

㉘ 陳公博：〈廣州一年來之勞工運動〉，《廣東群報》，1921年5月1日。引自《廣東群報選輯》，油印本，頁35。

㉙ 何錦洲整理：〈訪問梁復然先生的記錄稿〉（1964年5月），載《中共廣東黨史訪問資料》之一，油印本，頁3。

㉚ 陳獨秀：〈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1日）。參見林茂生等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135-36。